

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史事述略

杨 伟 段晓霞

【作者简介】杨伟,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;段晓霞,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新文学史料》(京),2023.4.83~89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“周扬与‘两材’研究”(项目编号:BJ2020084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扬主持的“文科统编教材”,是当时意识形态包括文艺界的大事,对当时以及后来(甚至到1980年代)的大学文科教育和文艺的发展,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为何要实行“文科统编教材”?周扬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?这一举措的实施过程与结果怎么样?本文拟把这件史事作为文学史与学术史的“现象”来考察。本文大致勾勒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的来龙去脉。当时周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,是党的领导干部,意识形态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,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与文学理论家,一身二任,研究中必须考虑到这种特殊性。此外,很多相关的文件资料尚未公开,本文主要根据公开发表或发布的论著、资料。

一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概况

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,是当时高校文科教育的需要,更是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需要。当时周扬是有雄心的,即通过教材统一编写,提升文科教学的质量,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及其他领域的中国化。

1950年代,在文科高等教育领域,几乎全都摒弃民国时期的教材,包括欧美教材,而改用苏联教材。有的是整本翻译过来就用。拿文艺理论教材来说,1954年2月,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受聘于北

京大学中文系,帮助建立文学理论学科。当时成立文艺理论研究班,主要课程由毕达可夫讲授。许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进修教师来听课。学员每听完一段课,就把记录稿寄回所在的大学,整理后再向学生讲授。蒋孔阳的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便是听完毕达可夫的课后,参照其理论框架写成的,“蒋孔阳从北大文研班毕业后,接受了季氏的文学理论体系,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时期”。^①毕达可夫的《文艺学引论》强调文艺的阶级性,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化倾向,存在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弊病,但给当时中国的文艺学建设确立新的体系,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而文学史则有王瑶在1950年代初撰写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,所依照的是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影响很大。其他文科教材也大都处于照搬苏联,或还没有教材的状况。

1958年,文科各学科也搞起“大跃进”,有的是“破除迷信”,一边拔“白旗”,一边插“红旗”,动员教员和学生编写新教材。1958年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吉林大学都有学生突击编成的“急就章”教材,包括《现代汉语》《语言学基础》等。1960年8、9月,中央决定在各个领域进行调整。高校文科当然也要“调整”,那么教材编写的迫切性就很突出了。1960年9、

10月间,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确定重新编选高校文科教材,并由书记处书记彭真受邓小平委托向周扬下达此项任务^②。

周扬于1961年4月召开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,修订包括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、教育、政治教育、外语的文科七类,以及包括戏剧、音乐、戏曲、电影、美术、工艺美术、舞蹈的艺术院校七类的教学方案,制定出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,包括教材297种(其中文科有126种,艺术有171种)。由此,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正式开始。

高校文科教材编选有具体的办事机构,即由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设立的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,并由胡沙、季啸风负责日常工作。教材编选集中在北京、上海,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,即由一个地区或单位负责,从高校和研究机构抽调人员进行编选。按文科七类和艺术七类,分为十四个教材编选组,并设组长^③。各组又包含多本教材的编写,每本教材由主编负责。例如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的主编是唐弢。“文科教材统编”涉及的面很广,不仅包括概论、原理、作品选读,而且进行参考资料建设。同时有的专业又不只编一套教材,如《文学概论》就分别由蔡仪、叶以群负责;《中国文学史》由游国恩、王起、萧涤非、季振准、费振刚负责一套,还由文学研究所编写一套。

1964年,“文科统编教材”因“四清”而停顿下来。1965年,周扬指出教材要继续编写:“7月23日蔡仪到中宣部汇报工作,得到的指示是:1.以毛主席的思想挂帅;2.反修为纲;3.少而精。”^④但是,周扬当时也在遭受批判而无暇顾及“文科统编教材”,教材编选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尽管如此,“文科统编教材”在“文革”前也出版了一些书目,如朱光潜的《西方美学史》。其他如王朝闻主编的《美学原理》、唐弢

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、蔡仪主编的《文学概论》等在“文革”后出版。

二、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的经过

周扬在“文科统编教材”上用力很多。在教材编选正式开始之前,周扬就已在上海进行调研。诸如开展中文、外文、哲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教育学等教学座谈会^⑤。1961年4月12日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,周扬讲话,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,编写中国自己的教材,指出:“所以要编出一个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,整理自己的遗产,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,只有这样,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,才是中国的教育学、中国的文艺学。”^⑥

在这一项目开始后,周扬做了多方面工作。他参与语文组、外文组、美学组、政治组、哲学组,《文学概论》《中国文学史》《教育学》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》《欧洲文学史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》等编选工作座谈会^⑦,说明教材如何编选,强调教材的重点,规定教材的结构、章节,指出教材编选的问题等。他还在教材编选过程中做汇报工作。1962年5月5日,《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》便对一年多以来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做了汇报。综合来看,周扬既规范“文科统编教材”的方向性,又给予详细的指导意见,还深入编写者中进行讨论,可见他在文科教材编选上格外用心。

在以上工作中,周扬主要关注如下几方面问题。一是几个关系的处理,即红与专、论与史、古今中外、“双百方针”。也就是强调又红又专,既要求学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,又是在这之上的各类专门人才;反对“以论带史”,从史料出发研究历史;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历史遗产,也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经验;坚持“双百”方针^⑧。二,周扬多次与组长、

主编、校长等人讨论教材编选所遇到的困难,并予以解决。例如,任继愈说道:“有些单位来的人少,力量好调整。人大和北大是全教研室一齐来,与教学有矛盾。”^⑨面对此种情况,周扬指出:“你那里能放走就放走。”^⑩在编写教材与学校工作的矛盾方面,周扬指示:“各个专业组还是要继续负责,坚持到底,个人可以调整一下。”^⑪针对概论教材编写的困难,周扬指出可以先搜集资料,撰写提纲。三,根据社会形势来调整教材编选的思路。如前文提及的1965年,蔡仪收到中宣部的通知,要求以毛主席思想挂帅、“反修”为纲、少而精原则修改教材。^⑫四,对教材编选成绩、缺点进行分析。周扬指出:“已经编出的各类教材,虽然质量高低不一,但一般比过去各校自编的都有所提高:材料比较充实了,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;在观点和资料的结合上也有了一些进步。”^⑬他还指出“掌握资料还很不够,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简单化和贴标签的现象还不能完全避免”^⑭，“对一九五八年的‘破’的经验还不够”。^⑮

三、周扬指导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《文学概论》《美学原理》的编写

在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期间,周扬重点抓唐弢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、蔡仪主编的《文学概论》和王朝闻主编的《美学原理》。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由唐弢担任主编,参加者有樊骏、王瑶、刘绶松、严家炎、刘泮溪、万平近、杨占升、张恩和等人。先进行资料的搜集,然后撰写提纲,并于1962年11月初在前门饭店进行讨论^⑯,再根据意见进行分工编写^⑰。1964年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(第一、二卷)征求意见稿定稿。“文革”后,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(第一、二卷)由严家炎、樊骏、蔡清富、吴子敏修改,第三卷手稿资料因在“文革”中丢失而重新编写,三卷分别于1979年6月、11月,1980年12月出版。

《文学概论》的主编是蔡仪,成员有王燎荧、柳鸣九、张炯、胡经之、吕慧娟等人。1960年6、7月,他们拟定教材提纲^⑱。1961年8月9日—15日在天津讨论《文学概论》提纲。1962年10月9日—2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逐章讨论。之后分工写作^⑲。1964年1月底完成初稿。1964年,“9月18日《文学概论》编写组的同仁到全聚德吃了一次散伙饭,工作暂时结束了”。^⑳《文学概论》在“文革”前,只形成讨论稿。1978年6月,蔡仪和王燎荧、吕德申对教材进行修改,12月完成,并于1979年6月出版。

《美学原理》的主编是王朝闻,参加者有杨辛、甘霖、于民、李醒尘、马奇、李泽厚、叶秀山、刘纲纪、周来祥、刘宁、洪毅然等人。教材编写先搜集资料^㉑。大约1962年8月,王朝闻留下李泽厚、叶秀山、刘纲纪、杨辛、甘霖、刘宁等人进行写作,其他人陆续回到原单位。他们同样分工写作^㉒。1964年5月《美学原理(上册)》(讨论稿)出版,包括绪论、审美对象、审美意识三部分内容^㉓。1979年暑假,王朝闻与刘纲纪、刘宁和曹景元三人分工修改《美学原理》^㉔。教材于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出版时改名为《美学概论》。

在指导三种教材编写时,周扬非常重视资料建设。“《史》的章节安排和编写人员分工大体确定后,唐弢同志便引导大家泡进历史资料之中,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。”^㉕再如,《文学概论》编写也先收集资料。这与周扬的要求有关。在《美学原理》的编写上,周扬指出,“你们搞美学的,还是先要搞资料”^㉖。《美学原理》编写组落实周扬的指示,编出很多重要资料,如《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选编》《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》《马克思、恩格斯论美》《苏联50、60年代美学讨论情况》等。

周扬指导三种教材编写的一项重点内容是给出教材大纲的意见。例如,周扬参加1961年8月9日、

12日、15日在天津,以及1962年10月10日、10月21日在北京的《文学概论》提纲讨论会。会上,他针对《文学概论》的结构,一些具体问题如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、形象思维、文学的本质特征、文学的语言、典型、人民性、党性等发表意见,指出问题。再如,1962年11月3日下午,周扬做《在〈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〉讨论会上的讲话》,谈“现代文学史怎么写法”“性质问题”“关于线索问题”“对‘左联’的估价问题”“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”“其他问题”。在美学教材方面,他谈美的本质等问题。由此可见,周扬深入到教材编写的内核,讨论各专业教材结构安排、具体问题等内容,能够使编者更好地围绕其思路进行编写。

周扬所谈的这些问题,一方面能够见出其理论的正确性。周扬在《文学概论》五编的结构框架方面的建议,表现出尊重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。在美学方面,他强调重视“中国经验”,重视古典美学理论。他显然认为,马克思主义美学的“中国化”,就要重视传统文论资源的现代转化。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方面,周扬指出对左联要评价其贡献与缺点,对作家要具体分析等。另一方面,也能见出其理论的局限性。例如,在《文学概论》编写中,他坚持文学从属论,即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,并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落实到阶级斗争中。

在指导三种教材编写过程中,周扬解决了人力、物力困难。例如,面对《美学原理》教材编写力量单薄的情况,周扬强调:“困难是底子差,找不到人。哲学史还可以找,美学更难找,要找一个能找的人也不容易。你们还是搞。作一个长期的计划,作为一个小小的单位,培养队伍。”^②在编写过程中,周扬从人力、物力上进行保证,“要钱给钱,要人给人,你可以按需要从全国调人”。^③周扬的支持,使得教材编写能顺利开展。

在指导教材编写时,周扬和主编意见的异同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教材主编在很大程度上对周扬的指示意见是认同的。唐弢便是如此,据万平近回忆:“编《史》自然不能回避文学与时代、文学与革命的关系,不能仅仅着眼于文体的变化和发展,用唐弢同志的话说,应当保持革命风貌。但他不赞成在《史》中大发议论,剑拔弩张,而同意周扬同志所提‘倾向性寓于客观叙述之中’,也就是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,一切论点都要有坚实的材料为依据。”^④即便后来周扬将阶级斗争的精神贯彻于教材编写中,“当时除了感到意外,唐弢和大家都没有对周扬的这一变化提出任何疑问,或者由此触发什么联想,从而影响编写工作的进行;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根据审稿会上的意见,将各自负责的章节尽快写出来,反而加快了工作的步伐”。^⑤然而,有时周扬与主编也有不同的观点。他与蔡仪便是如此。周扬在《文学概论》大纲讨论会上否定教材的结构,提出五编十一章内容,还指出教材大纲的诸多问题。这使得蔡仪“对《文学概论》的工作,这时只能持消极态度,尽可能不发表意见,自然,在讨论时也不能不说一点,因为自己究竟是主编。但他下定决心,能不说就不说,自己不作主。”^⑥1962年,“4月末,周扬又找他谈《文学概论》的纲目问题,在谈话中说了几次,要他负起责任来,并表示对美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看法。蔡仪明白,这是对天津会议时严厉批评的和解。”^⑦另外,他们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持不同的观点。周扬认为人民性是对人民的态度,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,与阶级性无关。而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产物。因此,他反对党性是人民性的最高表现。他虽强调阶级性,但不赞成用党性原则。蔡仪则反对人民性概念,认为此概念模糊了阶级性^⑧。为突出阶级性,而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是根本原则,“否认这个原则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,就是

否认无产阶级文学”。^③尽管如此,教材主编还是主要按照周扬的指示来编写教材。

四、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的影响

事实上,五六十年代“文科统编教材”取得了重大成绩。从质量上来说,教材编选汇聚了全国范围内专家学者,比1958年青年集体编教材质量高,且打破了沿用欧美、苏联教材的模式,建设中国自己的教材。另外,教材编选促进了当时的学校教学,解决了一些科目没有教材的难题,也激发了学术问题的讨论,提升了编写者的专业水平。在整个教材编选中,作为主持者的周扬有贡献,也有局限。

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,指出文科教材要运用马列观点、毛泽东思想,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,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在文科教材中得以确立。《文学概论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融入了中国古今优秀理论成果,形成具有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著作。《美学概论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,重视中国古代、现代美学资源,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,把劳动人民作为审美对象,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。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中无产阶级文学、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方向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,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。尽管如此,“现在编的书,史和资料多一些,论很少,两年来只出了半本论——上海的半本《文学概论》,教育方面的论不出来,语言学概论还没有出版”。^④这也说明“文科统编教材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方面不够深入。

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影响了八十年代文科复兴教材编写。1978年6月,教育部制定《一九七八—一九八五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》,多数重印、修订和续编1961年教材编写项目。如蔡仪主编《文学概论》、以群主编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、唐弢主编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、朱光潜主编《西方美学史》、

王朝闻主编《美学概论》等。高校文科复兴时的教材编选,采用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的经验。例如,“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”,“鼓励和支持学术上各种观点和学派相互讨论”,“正确贯彻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的方针,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”,“注意教材的科学性、系统性”,“坚持由浅入深、循序渐进和少而精的原则”^⑤。如主编负责制,在八十年代文科教材编选时被采用。因此,八十年代高校文科复兴教材编选以周扬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为参照,也根据之前的经验来调整编写思路。

在主持“文科统编教材”时,周扬也有其局限。他过于强调“统编”的意识形态权威性,有时是“硬性”规定,缺乏讨论,甚至影响与主编的沟通。在教材编选进展过程中,由于时代大的政治环境的要求,周扬越来越强调教材的政治性。比如,一开始他还主张教材编选要有专业性,要继承人类文化经典的智慧,要适当介绍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源流,等等。然而,1962年以后,周扬就转而强调教材要结合形势,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,强调斗争性。“四清”后,周扬更指出教材编选“文科教材建设、整个文科建设,怎么和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相适应,这是根本问题”。^⑥

“文科教材统编”虽然现在来看,有些“观点”已经陈旧,或者过于教条,但是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较好水平,也有助于文科各个分支学科的建立。比如唐弢、严家炎等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在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许多作家作品的基本评价方面,都是比较严谨的,有学理性的。能做到这样,实属不易。周扬在“文科统编教材”中也批评以政治代艺术的片面性,强调重视艺术本身规律。如他指出不要把文学概论写成对党的文艺政策的解释;强调历史观点,对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阶级斗争发展的具体状况作分析,等等。肯定周扬主持“文

科教材统编”所做出的贡献,同时也看到其中的得失教训,这对于今后文科的教材建设,乃至学科的建设,都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
注释:

①孙书敏:《北大文研班与新中国早期文学理论话——以蒋孔阳〈文学的基本知识〉为中心》,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2期。

②参见郝怀民:《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2019年第4期。

③文科组长有中文组的冯至、历史组的翦伯赞、哲学组的艾思奇、经济组的于光远、教育组的陈元晖、政治教育组的许立群、外语组一组的李棣华、外语二组的季羨林。

④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乔象钟:《蔡仪传》,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2年版,第157、157、105、143、116、121页。

⑤参见《周扬文集》(第三卷)中《在上海中文、外文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哲学、经济学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历史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教学系科教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文艺理论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艺术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

⑥周扬:《周扬文集》(第三卷)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年版,第303页。

⑦参见《周扬文集》第三、四卷中《在上海中文、外文教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哲学、经济学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上海历史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对编选〈文学概论〉的意见》《对〈中国文学史〉编选组的讲话》《在〈欧洲文学史〉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在〈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〉讨论会上的讲话》等文。

⑧参见《周扬文集》(第三卷)中《关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》一文。

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周扬:《周扬文集》(第四卷)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1年版,第140、140、259、144、144、249、141、254、253、141、141页。

⑳吴敏:《关于周扬的一组访谈》,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》2013年第2期。

㉑如严家炎负责绪论和“五四”部分;王瑶负责巴金、老舍、曹禺,以及抗战文艺运动的部分内容;樊骏负责左联,以及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等内容;鲁迅章节由张恩和、吕启祥负责。

㉒其中,张炯写《创作方法》一章。参见张炯:《周扬与中国当代文艺界——答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敏教授提问》,《河北学刊》2013年第1期。

㉓其中,于民负责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,李泽厚负责西方现当代美学的资料(后收入《美学论集》,即《美英现代美学述略》),刘纲纪负责马克思、恩格斯论美的资料,李醒尘负责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资料(主要来源于朱光潜为准备《西方美学史》翻译的资料);刘宁负责苏联当代美学讨论资料。

㉔其中,“审美对象”由李泽厚执笔,由刘纲纪修改。

㉕参见王朝闻主编:《美学概论(上册)》(讨论稿),1964年5月。

㉖刘宁、李世涛:《参加王朝闻教授〈美学概论〉编写活动(1961-1981)的回忆——刘宁先生访谈录》,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08年第3期。

㉗㉘万平近:《务实求真,光华长存——忆唐弢同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1993年第1期。

㉙樊骏:《编撰〈中国现代文学史〉的若干背景材料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2003年第2期。

㉚㉛参见蔡仪主编:《文学概论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0年版,第47页。

㉜参见《中国教育年鉴》编辑部:《中国教育年鉴1949-1981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84年版,第520-521页。